

书写的方式或许与传统内史不同，但无疑不再是游离于医学外围的“外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可能通过研讨会、研习营和青年学生的交换互访等多种形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改变以往受单一学科训练的状况，以期为实现多元交叉的相关研究提供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希望能通过这样努力，让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阐释历史，而且也能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省思现代中医和生物医学，从而为提升学界对医学（疗）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乃至建立具有较大影响力且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提供可能。

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笔者依然对中国医疗史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疾病医疗问题必将更加关注和重视；其二，随着学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本质必将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三，随着学术交流日渐广泛深入，国际上成熟的相关研究成果一定会更加全面系统地引入国内，为国内更多的研究者所了解。因此笔者相信，假以时日，医疗史终会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医疗史研究的药物转向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边 和

英文中的 Medicine 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既指作为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的医学，又可指医疗中给病人施用的药物。在西方学界，迄今为止的医疗史（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多以前一种含义作为根本，而将为人所用的药物视为从医学知识衍生出来的“物质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发出疑问：假如将药物——而非施予和接受治疗的人——作为关注中心，是否能发现以往医疗史书写中未被重视的新面相？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拟以此“药物转向”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批著作为例，希望能说明两点：第一，在什么样的学术理路影响下，药物正在成为医疗史乃至一般史学研究的新对象和中心话题；第二，虽然这一动向根源于当下欧美学术与社会的若干特殊情况，其方法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却并不限于一时一地。近年来的一批新生代学者已将视线转向对传统医药文化的重审，以及推动医疗史介入针对全球范围内药物问题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与西方同行有着相当多的交流机会与对话空间，更应增进沟通，取长补短。

一、书斋与药房：西方药物史的近代沉浮

专门历史的书写经常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同进退。19 世纪以来，西方医学的近代化带来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而涌现出大量由受过古典教育的著名医师所撰写的行业专门史。20 世纪后半叶，随着医疗机构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历史学本身对大众社会生活兴趣的提升，医疗史在西方逐渐成为未曾受过医学训练的史家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药物史研究也开始步入一个由窄入宽的转型期。在病理解剖学与生理学兴盛的 19 世纪，药理学逐渐成为医学的附翼，而治古典药物史需要涉及的文献庞杂而艰深，又掺杂了大量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信仰，使得这一领域长期以来乏人问津。英国剑桥的传奇学者 Agnes Arber 对传统草药的研究

初版于1938年,至今仍在印行,且仍未被超越。^① 哈佛大学的 Charles E. Rosenberg 教授曾回忆起他20世纪60年代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史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与一位致力于中世纪草药研究的学者 Jerry Stannard 比邻而坐,对 Stannard 满桌的书籍、卡片和笔记印象深刻。此后医疗社会史与文化史逐渐兴盛,学界的关注点亦集中在医疗体制、医患关系以及疾病、身体观念等话题。即使以 Stannard 的博学与勤奋,生前也未能药物研究扩大影响,他的论文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药物与药学》于其身后整理出版。^②

在文献考证之外,药物史的发展与药剂师 (Pharmacist) 这一职业群体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随着药学专业在19世纪末的美国不断规范、学院化,对历史叙述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美国第一个药学史专业群体诞生于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19世纪末,德裔移民克莱默斯 (Edward Kremers) 将德国当时世界一流的有机化学和结构化学训练介绍到威斯康星大学,并建立了美国当时第一个四年制药学专业,其后又首创药物学博士学位 (Pharm. D.), 力求将药学推进至学院研究的最前沿。1902年,在克莱默斯的倡导下,美国制药协会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建立了历史研究组。他又与学生 George Urdang 合著第一部药学史综合教材《克氏与乌氏药学史》,收集了大量重要的文献和实物资料。^③ 20世纪以来,该书多次再版,为药专业的学生所广泛使用。威斯康星的美国药学史学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Pharmacy) 也仍然保持着该领域的中心地位,并定期出版杂志《历史中的药学》 (Pharmacy in History)。美国目前仍保留三家独立药史职业学院 (费城、新英格兰与圣路易斯药学院), 训练本科毕业之后便可执业的药剂师。展望未来,药学史应会在药剂师的专业教育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促成药史与医疗界更紧密的合作。

在不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随着药剂师职业群体力量的增强,他们乐于书写和宣传自身的传统与成就 (如上文所述的美国及当代德国), 自然无可厚非。有趣的是,与此相对的一种趋势,是主流医学对药剂师以及广义上的药商群体的猜疑和批评,亦反映在西方20世纪的医学史书写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英国,其医疗市场传统中的三大分业 (医师、外科医生以及药剂师) 在近代早期围绕着处方权和收费问题呈现出白热化的竞争,而药商群体更是因为存在贩卖假药牟取暴利的行为受到行内行外的指责。早在1795年,英国制药协会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the Great Britain) 委托受过医学训练的学者 John Mason Good 撰写一部《以药剂师为中心的医学史》,揭露非法药商对处方规范和公众健康造成的损害。^④ 尽管如此,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医疗市场仍不可挽回地走向旧有行会权力的崩溃、市场准入和管理的混乱。Dorothy Porter、Roy Porter、Harold Cook 及 William Bynum 等学者的一系列专著对这一进程多有详细

① 最近的一次出版为 Agnes Arber, *Herbals,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otany, 1470-1670*,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Jerry Stannard, *Herbs and Herbalism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Aldershot and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9.

③ 最近一次再版于1986年 (第四次修订)。Edward Kremers and George Urdang, *Kremers and Urdang's History of Pharmacy*, 4th ed., rev. by Glenn Sonnedecker, Madison, WI: American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Pharmacy, 1986.

④ John Mason Good,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profession of apothecary; from its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period: the origin of druggists, their general encroachments on compound pharmacy, and the evils to which the public are from thence exposed; as also from the unskilled practice of ignorant medicasters ...* London: C. Dilly, 1795.

的论述。^①近年来, Jeremy A. Greene 等学者又将处方权演变的历史推进至当代, 特别关注一些热点药物的临床应用与慢性病的防治。^②

药商与药业在美国医疗史的论述中, 也经常扮演阻挠医学进步的负面形象, 特别是那些以大众媒体为平台出售秘方 (Patent Medicine) 致富的商家。历史学家 James Harvey Young 将他们形象地称为“灵丹妙药百万富翁” (toadstool millionaire), 并在其著作中致力于揭露江湖医生 (Quackery) 的骗局。^③在他的影响下, “科学与正义战胜贪婪与欺骗”成为美国 20 世纪医学史的一大主题: 以 1906 年“纯净食品与药物法” (Pure Food and Drug Act) 为起点, 国家力量与主流医学合力, 逐渐主导医药市场的游戏规则。二战后,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特效药物和专利政策让制药公司获得巨额利润, 并将其再次投入研发新药的昂贵竞争中去。近年来, 美国公众和知识界对“大药厂” (big pharma) 的戒备和审视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口服避孕药、镇静剂、吗啡等热点药物, 都牵系着家庭、性别与社会的微观与宏观政治, 成为战后美国史的重要篇章。^④与此类似, 药商与广告业近年来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生活与商业模式的重要个案。^⑤未来如能将同一时期医学西化、专门化的政治背景加入到文化史的视角中, 必将获得更多的发现。

虽然医界与药界的恩怨纠葛难以分拆, 药物仍然不断为医者与医疗史提供不容忽略的新课题。例如近年来, “安慰剂研究小组”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创立, 一方面在临床医学中试图用严格控制的定量研究去理解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 另一方面, 探讨暗示与治疗过程中的互动对病人产生的生理影响。^⑥虽然从表面上看, 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似乎在消解医疗活动的价值 (不吃真药, 病都会好), 但医学界对安慰剂的关注毋宁说是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医疗的本质, 最终希望将安慰剂效应考虑进临床治疗的可控制范围内。究竟如何理解治疗过程本身? 药物给予人的影响是否稳定可靠? 在更宽泛的人文关怀视野中, 未来的药物史研究必将在问题意识上再创新境。

-
- ① 主要著作可参考 Dorothy Porter and Roy Porter,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Harold J. Cook, *The Decline of the Old Medical Regime in Stuart Lond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W. F.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② Jeremy A. Greene and Elizabeth Seigel Watkins, eds., *Prescribed: Writing, Filling, Using, and Abusing the Prescription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remy Greene 目前正在进行通用名药物 (generic medicine) 来源及历史的一项研究。
 - ③ James Harvey Young, *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 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in America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④ 例如 Elizabeth Siegel Watkins, *On the Pill: A Social History of Oral Contraceptives, 1950-197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rea Tone, *The Age of Anxiety: A History of America's Turbulent Affair with Tranquiliz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 ⑤ 美国学者高家龙关于民国药商的专著开风气之先: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近著可参见定宜庄:《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5 年; 张宁:《阿司匹灵在中国——民国时期中国新药业与德国拜耳药厂间的商标争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9 期, 2008 年 3 月, 第 97—155 页。
 - ⑥ 详细内容请见 <http://programinplacebostudies.org/>.

二、学术理路举隅

(一) 方、药与实用技能：知识的社会学

在任何一个医疗传统中，谈论、处理和消费药物的人群都要远远多于书写系统性医学话语的少数精英，而且与药物相关的文字记述也占据了传世医学文献的绝大部分，但如此丰富的记载与史料却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在中国与西方的医疗史传统当中，我们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描画出经典医学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行医的职业环境与伦理道德，以及古代医疗相对于现代医学的标准而言所取得的“成就”，例如解剖学、外科手术、种痘术等。虽然这些工作自有其重要意义，但每当我们反观医籍目录，便会意识到，现有的研究实际上只触及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极微小的一端，更勿论那些未曾被收入传世文献中的文字与实物史料。不难看出，对于精英文本和个别成就的偏重，已经不能回答另外一些更加迫切的问题：所谓的“传统医学”究竟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开展？更广大的人群如何应对摆脱病患的需求？那些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经典（如古代中国的医经和希腊—罗马传统中托名于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著作），在实际医疗中的应用有多普遍？以药物为中心的取向，能让大量处理日常医疗事件的医学文本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来，从而为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种新颖的视角。

任教于塔夫茨大学的年轻学者 Alisha M. Rankin 的新书——《帕那刻亚的女儿们：早期近代德国贵族妇女的医疗活动》于 2013 年出版。^① 这部新颖的著作利用药物来探讨医疗知识与分工的社会性，并挑战了“欧洲医学正统自中世纪以来都由男性把持”这一定论。通过分析 16 世纪晚期几位德国贵族妇女之间的通信、财产清单与处方手稿，Rankin 描述了她们如何传递关于药物加工配方的技巧，如何在其封地制药并向大众发放、其渊博知识如何得到医界人士赞许，以及对大众医学知识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此外，Rankin 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性别的视角，更对药物知识在早期近代医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梳理。通过分析贵族妇女医疗实践和方书文献 (Rezeptliteratur) 之间的紧密关系，她注意到，在 16 世纪的语境中，人们经常性地使用 Kunst (复数 Künste, 来源于意指能力的 können) 一词来描述方药，但其意义却要比书写在纸上的方子 (Rezept) 要深广。Kunst 是更宽泛的技艺、实践性的知识，是关乎如何把纸面药方转化为有效药物 (Remedy) 的经验。Rankin 的研究将方、药与相关技艺的讨论置于早期近代欧洲医疗史的最新前沿，也为跨文化的比较提供了扎实的参照。她提醒我们，历史中的药物并非不言自明的客体，其价值与药效总是藉由拥有某种知识与技艺的人群之活动而不断被阐发。而追踪与记录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正是医疗史的视野由人转向物的题中之意。

(二) 药物的全球史：从大航海时代到后殖民的今天

从古代的奢侈品与香药贸易，到近代常见的大宗“草根木皮”，载着药物的商舶将相隔万里的医疗社群联系在一起。药物在跨文明交流史乃至全球史书写中早已占据重要地位，关于底野迦 (Theriac)、人参、大黄、金鸡纳、阿魏乃至烟草和鸦片等重要药物，中外学者著述颇丰，成

^① 帕那刻亚是希腊神话中医学之神 Asclepius 与解救苦难女神 Epione 的女儿，代表着完全的治疗。Alisha M. Rankin, *Panacea's Daughters: Noblewomen as Healer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就斐然。^①近年来,科学史界对于实践与物质文化的兴趣,又使药物的全球史不再仅仅关注于贸易与消费,更着眼于陌生药物对于文明既有知识体系的冲击与重塑:如果我们不再假设某种药物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药物知识本身的交换与变容,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一种地方性知识,如何被“翻译”为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是否都在最终被认定为普适的近代药物学中留下了印记?在更大的层面上,药物的全球史是否见证并促成了长时段视野下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开端?

Harold J. Cook 在其《交易之事物:荷兰黄金时期的商业、医学与科学》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东南亚殖民地收集药用植物,以及在日本长崎介绍西方医学、收集并翻译汉医书籍的活动。^②与此相似,英国学者 Pratik Chakrabarti 着力于研究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医疗市场,并强调殖民时期的物质文化(例如“集市医药”, bazaar medicine)对于 19 世纪药学知识系统的建立具有决定性的形塑作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发生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口岸的物质交换与殖民母国的知识生产割裂开来。^③在这些研究中,药物以及关于药物的知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贸易史与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为研究科学史和自然知识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医疗史领域的不少新著作,都开始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加细腻地分析 20 世纪下半叶生物医学全球化的展开,并特别关注药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似的思路也被应用于重新审视看似抽离于地缘政治之外的现当代医药。人类学家 Adriana Petryna 广受好评的近作——《当实验在旅行:临床药物试验与被试者的全球搜索》,就揭示了各大制药公司推行新药临床试验的跨国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与冲突。^④墨西哥裔学者 Gabriela Soto Laveaga 的《丛林实验室:墨西哥农民、国家计划以及口服避孕药的产生》一书,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发现墨西哥南部的一种野生山芋(Barbasco)可以用作工业合成可的松、孕酮等药物的原料,其后全球性制药企业大规模进驻,与墨西哥政府和当地农民就山芋的种植、收获与利益分配开始了漫长的合作与协商。Laveaga 的研究不仅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医疗史中的重要性,更以医药为例,细致勾画了农民与国家政治舞台及外国资本之间的互动。^⑤

加纳裔年轻学者 Abena Dove Osseo-Asare 目前任教于加州柏克莱大学,基于她博士论文的新书《苦口之根:在非洲找寻草药》于 2014 年出版。^⑥本书基于作者在加纳、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地进行的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访谈,分析了六种传统药用植物在近代转型为商品药的过程。

① 参见陈明、蒋竹山、张哲嘉等学者的著作,中文综述可参考蒋竹山:《“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人文杂志》2013 年第 10 期。

② Harold J. 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特别是第 8 章及第 9 章。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早期近代世界的物质、处方、技巧与知识的路径”研究组亦集中了一批兴趣相近的学者。参见 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_Smith_Itineraries。

③ Pratik Chakrabarti, *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Adriana Petryna, *When Experiments Travel: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Global Search for Human Subje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⑤ Gabriela Soto Laveaga, *Jungle Laboratories: Mexican Peasants, National Projec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Pil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⑥ Abena Dove Osseo-Asare, *Bitter Roots: The Search for Healing Plants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西方后殖民史学传统一向擅长于从殖民政府档案中寻找材料,批评北半球殖民者对南半球社群的控制与剥削;而 Osseo-Asare 的研究则利用对民间医者 and 政府科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殖民时代之后,各民族国家如何试图继承殖民时代的知识体系,同时利用自然与传统资源在新时期发展国家经济。事实上,对草药的研究与争夺不仅仅反映了北半球资本与南半球民众的对抗,更揭示了非洲本土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的诉求。为在国际科学界获得一席之地,并向国家争取项目基金,非洲本土科学家在取得药物研究经费与专利的同时,也侵害了地方民众应得的利益。Osseo-Asare 提示我们,传统医药与现代生物医学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地方性与全球性知识实际上互为表里。此外,药物的全球史必须脱离西方—非西方的简单二元分析框架,关注在地政治与全球性知识的复杂互动。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现代药事制度看似起源于西方,但其赖以运作和更新的资源却是全球性的,其影响也及于世界每个角落。传统医药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例如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药青蒿素抗疟功能的认定,无意中推动了非洲传统草药研究的新一轮热潮。上述著作对于当代药物与民生问题的关注及其全球性视角,无疑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与反思自身的处境与选择。

(三) 药物的生态学与物质性:从内部解构医药文化传统

任何一个医药传统在面对来自远方的新药物时,必定将其放在自身知识背景下加以考量与吸纳。以往的药物史研究,较偏重于那些价值特别昂贵的“殊方异药”——不论是由西域东来,还是西方人眼中的远东奇货。考虑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大多来源于当时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印象,于是留下的记载难免不成比例地突出了少数珍奇药物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形之下,我们对于本土文化中多数药物的来源、价值和文化想象反而缺少整体性的把握。如果说爬梳多国史料,对某种珍奇药物进行考察已然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毕竟研究对象相对明确;而如何在关于成百上千种药物的医学文献中找出描述整体图景的线索,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英国学者 Laurence Totelin 在其对希波克拉底医著(Hippocratic Corpus)的研究中,留意于以往少人关注的处方医药,特别是一批妇科方书。她首先细致地梳理了方论类记载在古希腊医学传统中的演变,接下来讨论口头与书面传授的证据、对方药的使用在不同社会身份医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妇科医疗中带有性和生育隐喻的药物。^①特别可贵的是,她在第4章中追溯希腊医学体系中常用药物的来源分布,列举了几种珍贵的舶来药物与大量本地药物之间的对照。她的研究建立在欧洲学者扎实的古典文献学训练基础之上,对我国医史文献研究者也会有不少借鉴意义。

如果说 Totelin 试图以传世古典文献为依托,重构古希腊医学的物质基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资深学者 Francis Zimmermann 对印度阿育吠陀医药传统的解读则更富想象力。他的早期著作《丛林与肉之芳香》开宗明义地提出:“在古代印度,没有动物学,只有一系列肉的清单……动物学与植物学的原初发展被消解为药物学。”^②从医方与药物知识的字面意义出发,Zimmermann 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横贯印度中西部干燥平原—东部沿海湿润雨林的文化轴心。

① Laurence Totelin, *Hippocratic Recipes: Oral and Written Transmission of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in Fifth-and Fourth-Century Greece*, Leiden: Brill, 2009.

② Francis Zimmermann, *The Jungle and the Aroma of Meats: An Ecological Theme in Hindu Medic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viii.

在这个地理—文化空间中，生活着种类各异、性味主治分殊的动植物。通过解读与分析古代印度医药文献中对药用动植物的描述，Zimmermann 为读者重新构建出古代印度文明对其地理、生态环境赋予的集体想象，一种“宇宙的生理学”。

事实上，作为一位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印度学家，Zimmermann 的目标远远不止于解释古典医药文献，也无意对严格意义上的医疗史发言，而是想要以药物为切入点，来阐释隐含在其中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与身体观。哈佛大学东亚系栗山茂久教授在不久前的一篇书评中提出，谈一种药物与人的关系相对容易，而整体性把握多种药物的“历史生态学”（a historical ecology of drugs）则是更难和更有吸引力的任务。^①

上述研究所处理的材料迥异，着重点也各有不同。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通之处，即任何一种医疗文化对于药物的认识和使用，都可以成为理解与阐释该文化独特的宇宙观以及生态与物质环境的入手点。这种思路无疑是受到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将人类药物知识的产生，看作是人对外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其危险或许在于过度阐释：是否每一种医药文化传统，都可被看作是某种更深层次的精神类型或宇宙观的完美表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共时性（synchrony）当中显现出来的对称结构，必然同时具有历时性（diachronic）的一面。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人类学对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与阐释无疑是一种富有冲击性的提醒，鼓励我们在研究中试着用全局性的眼光去理解纷繁复杂的细节。但同时必须克制从史料中建构出一种玄虚结构的诱惑，而不要忘记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看作历史人物生活经验的出发点。

结 语

2014 年夏，香港浸会大学举办题为“身体、文化与社会：中国药物学史”的会议，集中了中文学术界活跃在这一新生领域的众多学者。笔者相信，通过对西方医疗史“药物转向”背后学术理路及现世关怀的梳理与分析，将有益于进一步拓展未来研究的视野，由人及物，以物观人。归根结底，药物既外在于人，又不能独立于人的精神领域来施展效用。从古到今，人类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观念都与作为治疗手段的药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今天这个生物医学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大行其道的年代，医疗史尝试探索以药物为中心的研究转向，正逢其时。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Shigehisa Kuriyama, “Review of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by Carol Benedic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3, no. 1 (June 2013), pp. 190-194.